



西方制度建构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主编 陈晓律

主教的书信空间

奥古斯丁的交往范式在《书信》中的体现

王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NLIC 2970672258

国家“211工程”三期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项目



西方制度建构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主编 陈晓律

主教的书信空间

奥古斯丁的交往范式在《书信》中的体现

王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教的书信空间 / 王涛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西方制度建构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ISBN 978-7-305-08048-7

I. ①主… II. ①王… III. ①奥古斯丁,

A. (354~43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1580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西方制度建构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书 名 主教的书信空间

著 者 王 涛

责任编辑 黄继东 编辑热线 025-83592193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20 印张 16 字数 320 千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8048-7

定 价 39.8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南京大学的世界史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南京大学是国内较早从事世界史研究的高校之一，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学科创始人蒋孟引教授从英国留学归来开创了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同时也奠定了本学科的基础。而王觉非教授的努力工作，也使本学科世界史研究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除蒋、王二公外，张树栋、张竹明、瞿季木、沈学善、尤书蛟、李庆余等人，在世界史领域的其他方向上也多有建树。钱乘旦、杨豫、沈汉、陈晓律等人，除对本学科英国史研究的传承与拓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外，还开拓了比较现代化、欧洲农业史、欧盟研究、史学史、和平学等新的领域；而钱乘旦在调往北大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全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高了世界史学科的声誉。徐新的犹太史研究在国内享有盛誉；任东来在美国史方面锐意进取，其成果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陈仲丹在世界文化史与欧洲古典文明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图文并茂的著作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十分有效地扩大了世界史学科的影响；陈祖洲专攻英国现代史，最近则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北欧国家；于文杰对文化思想方面的研究颇具特色，而刘金源在世界现代史方面也很有心得。其他青年教师在世界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过学科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本学科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目前，在国内一些设有外国史研究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常常可以发现南大毕业的世界史研究人员。同时，南大自身的

世界史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原有的政治史、经济史逐步扩展到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律史、家庭史乃至环境史;而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从互联网获取资料的便利条件,也使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具有了相当的深度,一些观点和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外同行的赞扬与重视。但略有遗憾的是,多年来,南大尽管培养了众多的世界史博士和硕士,产生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世界史学者,却缺乏一个固定的出版阵地。因此,各种世界史的专著往往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以至本专业的成员要想对这些世界史的专著整理归类都成为一件繁复的工作。当然,由不同的地方出版,对于扩大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影响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能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出版阵地,定期地刊出世界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十分有利的。由于种种原因,南大世界史学人的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斗转星移,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持续冲击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国家对本校世界史重点学科的扶持,也使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得到了实现的机会。借助“211 三期”和“985 三期”项目的启动,南大出版社同仁的慧眼识珠和鼎力相助以及南大毕业的历届校友的无私奉献,我们终于可以将本学科世界史研究的系列丛书付梓出版。这既是本专业的幸事,也是国内关注世界史研究同行的幸事。

这样的一件大事,落在我们身上,确有诚惶诚恐之感。如有不当之处,烦请诸位学者和同行不吝赐教。

陈晓律

2009 年 9 月

于南京龙江小区南大教工宿舍

序 一

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这个说法也可用于西方基督教思想史之于奥古斯丁。将“承前启后”这个词用在奥古斯丁身上再适合不过了:承前,是因为他是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从保罗到新柏拉图主义,从希腊教父到拉丁教父的涓涓细流,到他这里汇合成了大江大海,浩无涯涘;启后,是因为无论经院哲学还是新教神学都继承了他的衣钵,发展了他的某一个侧面。如果说整个基督教思想史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么站在最高的一两个山峰上,你就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来龙去脉,对整个地形了然于胸。奥古斯丁就是这样的一两座高峰之一。

关于奥古斯丁的地位,可以引用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帕利坎所说的话:“任何神学家只要写有《忏悔录》、《上帝之城》或者《论三位一体》中的一部,就可以在知识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奥古斯丁不仅写了这三部书,而且另外还有大量的著述。他是一位全能的天才。”“在基督教思想与主张的演化中,奥古斯丁的作用影响到每一种教义的历史”。^①确实,在西方基督教神学的核心内容三位一体论、言成肉身论、创世说、原罪论、本性与恩典、自由意志、圣灵与爱、预定论、正义战争、上帝之城、信仰与理性、政教关系、圣经解读、宗教符号与象征、光照说等方面,以及西方哲学所关心的自我论、时间论、语言符号学说、历史神(哲)学、政治神(哲)学等方面,奥古斯丁都有开创性的、系统而深入的著述,是无法绕过去的人物。大思想家和小思想家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前者在广度、厚度、深度和长度上,都有后者所不可比拟的力量。小思想家可能在一两个问题上有原创性的贡献,但是大思想家几乎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有透辟而深入的思考,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会使我们也能“高

^① 帕利坎(J. Pelikan)著,翁绍军译:《大公教的形成》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第371—372页。

瞻远瞩”起来。这种大思想家的魅力,我们可以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那里感受到,也可以在朱熹、王阳明、牟宗三那里感受到。

一千六百年来,奥古斯丁的思想吸引着无数的读者,滋养了诸多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其中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笛卡尔无疑是佼佼者,连胡塞尔、海德格尔这样的现代哲学家也受益匪浅。一个人只要专心倾听并领会奥古斯丁说了些什么,就一定能够有所获:他不是一个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说话尤其说废话的思想家。但是,鉴于奥古斯丁一生所写的著作极其丰富,要全面地、准确地把握所谓的“奥古斯丁思想”,并非易事。历代学者和神学家、哲学家皓首穷经也仍旧只能像“盲人摸象”那样把握奥古斯丁的一个侧面,就是一个明证。

奥古斯丁一生写了约96部著作,共约一千“卷”,其字数相当于一套标准百科全书的十五卷,若全部译为中文,估计将有1500万字。最著名的著作有“神学三部曲”——《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其余可以单独成篇的重要著作尚有:早期哲学对话录(包括《驳学园派》、《论幸福生活》、《论秩序》、《论意志的自由选择》、《论音乐》等等)、《基督教教导》、《创世记字解》、《诗篇阐释》、《约翰福音评注》、《论灵魂及其起源》、反伯拉纠派著作(包括《驳朱利安》)等等。另外,他在教会任职40年,定期布道,一生共讲了约八千次,今天留下来的布道有500多篇(他讲道时台下有记录员录写)。他与当世的知识分子、教会人物(主教、同事、平信徒)、政府官员、思想对手(异教与异端)有广泛的通信来往,就形形色色的问题和主题展开思考,今天留下来的书信有300多封,这些信从寥寥数行到洋洋万言,亦是一笔极其丰富的遗产,对我们了解奥古斯丁其人其思及其时代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就近些年西方奥古斯丁研究的状况而言,有八大著作得到最多关注:《忏悔录》和《上帝之城》知名度最高,仍是重中之重,其次是布道集和书信集,以下是《论三位一体》、《基督教教导》、《约翰福音评注》和《诗篇阐释》。相形之下,其他著作被关注度就较小。传统上较为重视奥古斯丁的神哲学,因此《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这类神学著作受到关注。但随着对奥古斯丁时代罗马和北非的历史研究的展开,布道集和书信集中所透露出的诸多社会和文化信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975年Johannes Divjak新发现29封书信(其中26封为奥古斯丁所写,两封是写给奥古斯丁的,另一封是杰罗姆写的),1990年Francois Dolbeau新发现奥古斯丁26篇布道(后来他还发现了3篇),都像

当年人们发现死海古卷、埃及灵知派文献以及前些年我国发现郭店楚简一样,这些新发现的书信和布道引起了相关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奥古斯丁研究。

二

奥古斯丁研究在西方是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奥古斯丁思想的每一个侧面都几乎已经或正在被关注,如果说奥古斯丁本人的著述已经如江河浩渺,中世纪、宗改时期、现代以及当代研究其思想的著作则更如汪洋大海,船舰不精良或水性不好的人,很可能在里面被淹没。奥古斯丁研究被归入“教父学”、“古典学”、“哲学”、“神学”、“思想史”等门类,但所有这些分类都只是“方便法门”,实无法穷尽奥古斯丁。因此我们只能按“莎学”、“红学”一类的称法称其为“奥学”。

我国的奥古斯丁翻译和研究蔚然成风,已成为一门“显学”,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最近十年的事。在翻译方面,《论意志的自由选择》、《论三位一体》、《基督教教导》、《论四福音的和谐》、《论信望爱》、《反朱利安》、原罪论文选、道德论集等有了中译,《忏悔录》和《上帝之城》还有了多个译本。虽然这仅占奥古斯丁著作总量的一小部分,但无疑比起以前国内只有一本《忏悔录》已极有改观了。在研究方面,傅乐安、赵复三在八十年代作了奥古斯丁的评传,范明生、赵敦华、唐逸在九十年代已较为详细地论述奥古斯丁的神哲学思想,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予人深刻印象。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北大和人大已开始有博士生专攻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研究在我国开始进入专业化时代。这十几年来已涌现一批奥古斯丁研究的专著,如张荣《神圣的呼唤》(1999)和《自由、心灵与时间》(2010)、周伟驰《记忆与光照》(2001)和《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2005)、夏洞奇《尘世的权威》(2007)、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2008)、吴天岳《意愿与自由》(2010),王涛的这本《主教的书信空间》是最新的一本。这些研究,或偏重哲学,或偏重神学,或偏重历史,显示了奥古斯丁的不同“面相”,逐渐建构出一个立体的奥古斯丁。在写法上,或宏大,或渊博,或精微,或以思辨追问见长,或以文本解读见功夫,各领风骚,彼此之间起到了一种互相补充和互相提醒的作用。

王涛出身北大历史系,跟从彭小瑜教授做西方历史研究多年,在读博期间又获得赴德国学习两年的机会,这使他对德语方面的奥古斯丁研究资料和现状也十分了解。几年前我曾为某杂志编一期奥古斯丁专辑,王涛的师兄夏洞奇君把王涛关于奥古斯丁书信的文章推荐给了我。

那篇文章就是现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文字简练精细,没有冗词,后来见到他本人时,方知“文如其人”,说话不多,但都实在妥切,点到为止。

上面说了,奥古斯丁书信的研究在1975年新发现29封书信后有一个热潮,王涛参考的著作中,大部分与此不无干系,尤以90年代以来为盛。可以说他的研究跟国外的直接接轨,几乎没有“时间差”。对于国内的“奥学”来说,这更是专门做奥古斯丁书信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有其“开创者”的特殊意义。

我读完全书后,感觉在原著阅读、研究文献的掌握、语言功底和考证能力上,作者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多有前人所不能逮处。作者对相关书信原文的熟练引用,对英德双语文献的熟悉程度,已超出前贤。具体如对于书信中的奥古斯丁和正式著作中的奥古斯丁的不同“面相”及为何如此的分析,对古典书信与教会书信的区别尤其教会书信如何树立教会权威,对于两大教父杰罗姆和奥古斯丁通信中的分歧和矛盾,对于教父们在如何处理教会和政府关系问题上的反复,都使我耳目一新。王涛所展示的奥古斯丁的庞大的“书信帝国”或“书信空间”,在书中已有非常清晰、具体的呈现,读者自然可以阅读得知。在这里,我只想附骥作一点补充说明,或者一点小小的批评。

三

奥古斯丁对理想的人际交往形式的向往,跟他对“友谊”的生命体验和对理想人类社会的神学理解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在少年时代与小伙伴们一起偷梨,从而体会到结伙犯罪的快感,还是在迦太基求学时跟摩尼教友们友好相随,彼此尊敬,帮助提携;无论是在加西齐亚根与一群亲友结成“哲学小组”创作“哲学对话”,还是在回到故乡小城塔加斯特后建立了一个学园式的隐居地;乃至最后在希波教会的园子里建了一个隐修院(后来那里培养出了一批主教),如何按照上帝的意旨建立理想的社会“上帝之城”,达到“在爱上帝之中爱人”的基督教“友谊”模式,达到人们彼此相亲相爱、心心相印的理想状态,始终是奥古斯丁思考的主题之一。如果说与少数亲友所结成的小团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这种较理想的状态,但若将之扩展到希波教会、乃至整个罗马的教会、国家和社会,则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挑战。书信作为古代最具传播性的交往手段,作为说话者不在场的谈话,实际上是奥古斯丁这种理想交往模式的延伸和推广。不管收信人是谁(同事、平信徒、异端、异教徒、官员、贵族),奥古斯丁都抱着一种基督徒的谦卑态度与他

们交往,希望能够在经文和理性的基础上,使他们服膺基督,像基督那样爱神爱人,消除彼此的不谐,达到精神的一致与和平,也即达到同心同德的“友谊”。但是,正如王涛在书中指出的,奥古斯丁作为一个主教,他的权威只限于教会之内(还是有限的),对于政府乃至社会是无能为力的。如在解救奴隶一事上他就无法摆脱当时的社会习俗、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即使在教会内部,也充满了歧见与冲突,奥古斯丁与多纳特派、伯拉纠派的斗争,尽管都以后者的屈服终结,但胜负双方还远远没有达到“友谊”的融洽程度。也就是说,奥古斯丁的“交往”撞到了南墙。迫于政府的压力进入公教会的多纳特派教徒,心底的怨恨大概要到他们的子孙辈才能消除。而对“基督教国家”的悲观,使奥古斯丁的“友谊”只能局限于“无形教会”一类的想象世界中。

如王涛书中附图所示,奥古斯丁的“书信空间”,东至巴勒斯坦,西至西班牙,北至米兰,南至吐索罗。在这片广大的区域内他用书信来跟人对话、交谈、争辩、辩论,都是为了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精神,说服人们信从它,按照这种精神做人,为了它的利益行事。应该说,单单研究这三百多封书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信中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五花八门,很难用一个统一的线索把它们串连起来。但是如果从理想的交往模式或者奥古斯丁所理解的“友谊”去考察这些书信,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奥古斯丁无非是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为了基督的利益,为了使罗马帝国的人们都信从基督,像基督那样爱神爱人,最终趋向于一个和谐的“上帝之城”而奋斗不已。奥古斯丁虽然在这种书信交往中通过引经据典和理性论证部分地建立了他的思想权威,但罗马帝国的现实是粗粝和坚硬的,离他向往的“上帝之城”差得太远。他的理想只能留待后来的神学家和基督徒帝王们去实现了。

四

在奥古斯丁的通信者中,有一些人对他的神学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涛在书中详细地谈了奥古斯丁跟安布罗斯的交往,并对两人并没有书信往来这一奇怪的事作了分析。但是,在米兰的朋友中,对奥古斯丁个人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安布罗斯,而是西姆普利齐亚努。安布罗斯太忙碌,而且身为帝师,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奥古斯丁这样的外省青年很难进入他的视野焦点。西姆普利齐亚努作为一个年长的朋友则有耐心和时间跟奥古斯丁进行密切的个人交往,在《忏悔录》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奥古斯丁的心理状态和思想进展十分了解,正是他

把维克多瑞的事迹介绍给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米兰花园皈依之前也正是从西姆普利齐亚努那里受到了激发（维克多瑞的三一论著作对奥古斯丁本人的三一论有直接影响）。更关键的是，在奥古斯丁离开意大利回到北非五六年后，西姆普利齐亚努还一直关心着奥古斯丁的灵性生活。正是他在一封信里问到了《罗马书》中一些经句的解释问题，促使奥古斯丁写了著名的《致西姆普利齐亚努》（396/7年），神学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早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转变为后期以“恩典”和“预定”为要素的“奥古斯丁神学”。

如果我们把奥古斯丁的一些论战文章也视为“书信”（它们往往是公开信，有时是附在给朋友或同仁的信后的），把他在希波任职后交往和接触到的一些北非神学家著作也放到“空间”视野之内，则对把握奥古斯丁思想的发展会很有用。担任神职对奥古斯丁的思想发展是一个转折点，由此他越来越偏离希腊哲学，越来越偏向圣经传统，而他对圣经的解释受北非神学家的影响很大。比如多纳特派的理论家提康尼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把这些因素也放到“交往空间”中去，把奥古斯丁放到不同的“小传统”的脉络交汇和扭结中去，无疑会使我们对奥古斯丁有一种“新异感”：他对敌方思想的吸收是如何有益于他自己的思想的建构的。因此，放宽了看，“交往”就是“朋友之间的对谈+对手之间的对话+敌我之间的对抗”。其中，作为一个主教，奥古斯丁都努力地让自己带着“爱的谦卑”去为对方的“最终利益”（核心是灵魂的得救和永生）着想。

这样可以看出，奥古斯丁的“书信空间”不仅是一个宣传他自己的主张、说服别人和确立权威的过程，而且也是奥古斯丁本人在其中得到挑战、加以回应、或者拒绝或者吸收、不断成长的过程。奥古斯丁对于政教关系、对于教会权威的看法，跟他与多纳特派斗争期间和其他主教、政府官员（如玛塞利）的讨论有关，自然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和预定论在和伯拉纠派论战的过程中也被不断强化（他们之间的论战也多以“公开的书信”的形式传布），而跟他在不受刺激的情况下的温和说法有所不同，这即表明“书信空间”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空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广阔的“书信空间”所展开的交流、沟通、辩论，虽然不能说都达成了“友谊”，达成了“一致”，有时甚至起到了扩大加深分歧的反作用，但无疑，通过这些书信交谈，通过不断的经文解释、理性辩论和说服，奥古斯丁调整、改变、深化、系统化了自己的思想，在很大一部分主教和政府官员那里赢得了赞同，确立了他的思想

(这是主要的)和个人(这是次要的)权威,进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古斯丁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系统性在当时就被很多人认识到了,在对经文的系统理解和理性说服他人的能力上,他都深深地令人们折服了,他的不少书信和著作在传送的路上就被人广为传抄即为明证之一。奥古斯丁权威的确立,首先是因为他的思想的深度,人们都把他视为保罗的传人,其次才是他的教职地位和活动能力。在这个权威的过程中,书信作为交流和对话、辩论的手段之一,无疑起到了扩大他的思想,使更多人信服它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要产生误解,以为奥古斯丁是通过书信及谦卑的态度为他赢得了朋友,从而在各种会议上“我方”人数占了上风,历史虽然有这种偶然(有时主教会议中大多数人只是随大流,有主见的也就几个人而已),但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靠着“关系”在当时最严肃的事情(信仰与教义)上占上风,应当说,奥古斯丁取胜的原因仍主要是他的思想赢得了人们。

五

对奥古斯丁感兴趣的研究者来自方方面面,文学、历史、哲学、神学、古典学都大有人在。王涛这本书大致可以归入历史的研究,而跟神学或哲学的有所不同。如果说后者所做的是概念史、观念史等“内史”,注重的是奥古斯丁思想系统中概念的内在演化逻辑和彼此间的缠绕,那么前者做的就是事实考据的“外史”,注重的是奥古斯丁的生平事实、交游范围及进展、所受影响与对他人之影响等“硬事实”。我们要研究某一个思想家,首先一定要将他的生平、交游、师承及基本思想的来龙去脉和分期搞清楚,然后才能研究思想内部概念网络的演化轨迹。王涛这本书偏重于“外史”,可以作为人们了解奥古斯丁的基本读物。但亦涉及到奥古斯丁的一些基本观念,如友谊观、政教关系观等等。有些观念在深度上我觉得尚可挖掘,比如“友谊”就可以一直通到他的神学核心:三位一体之内的爱的关系,作为上帝“形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关系,“爱”与圣灵、恩典的关系等等。在有些问题上他言简意赅,点到为止,这对于熟悉奥古斯丁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因为他们能听出话里丰富的“背景音”,但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却可能需要作一些说明和展开。好在王涛行文清晰易懂,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如王涛所说,奥古斯丁书信涉及内容庞杂,并无统一内容,因此,要按某一个主题如“交往”来统括它们也是勉为其难。确实如此。我倒宁愿把“交往”理解为一个线索,把一些散落的主题串穿起来,就跟一篇卡

尔维诺式的后现代小说一样。像妇女观、政教关系观、奴隶制、神学权威(信仰与理性),在传统神学或哲学式研究中是迥异的主题,但现在可以通过“交往”松散地串在一起。这亦像点彩画,看似不相关的东一点西一点,最后就点染出一个奥古斯丁的“面相”。

对一本专著是不能要求过多的,因为它的擅长也正是它的短处,它必须“在限制之中显身手”。把一些奥古斯丁书信交往的“硬事实”搞清楚,把这项研究做深做细,在这方面有他人无法替代之处,这就是这本书所做的最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庞然大物”的奥古斯丁,任何一本书都是不可能穷尽的,最多能对其某一侧面有所管窥,因此,现阶段在中国能有人将奥古斯丁书信研究推进到如此地步,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和视野,我们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周伟驰

2010年10月12日于北京

序 二

几乎没有哪位古典作家像奥古斯丁那样，保留下来的各种文字作品展现出与他人对话的品性：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奥古斯丁同朋友或弟子，甚至与自己的母亲和儿子展开哲学对话；他还因神学问题与不同对手发生争执，形成所谓的论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辩论记录，另一些则是采取对话体写成的文章），在这样的作品中，奥古斯丁同论敌发生观念交锋，对手的立场往往在引文中体现出来；通过书信交流，奥古斯丁同朋友、熟人甚或陌生人讨论哲学以及神学问题，有时也会涉及人生和个人问题。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对话文本，奥古斯丁其他一些作品也具有对话的性质，比如他的释经著作就具有辩论性，在行文中尝试回答涉及圣经的问题（它们或者来自不同人群的困惑，或者是他自己发出的疑问）。有时，释经著作也是经过编辑整理的讨论记录，反映奥古斯丁与同侪、弟子和朋友对圣经中微言大义的探讨。可以看到，奥古斯丁是寻求交流、时刻准备对话的知识分子、导师和主教，这是从他自己的著作中传达出来的一种形象，也能够被波斯底乌的《奥古斯丁传》（*Vita Augustini*）证实。波斯底乌是奥古斯丁的同道和助手，他撰写的传记特别关注奥古斯丁与他同时代人的争论与对话。

没有哪种古典文集像奥古斯丁的文字那样，能够为我们展示公元400年左右，在主要涉及哲学-神学问题以及教会政治时，人们进行讨论的情形——如果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讨论”这个概念，它不仅是纯粹的对话录文体，而且包括各种传统的文本样式——主要是书信和辩论记录。一方面，在早期对话集中，奥古斯丁同博学的思想家们讨论哲学问题，由此塑造了公元4世纪80年代米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态。对话文体实际上是一场真实发生过的讨论。不过，奥古斯丁以神职人员的身份参与的讨论，涉及更广泛的内容，也因此更具影响力。实际上，他通过公开发表文字，让自己作为对话的参与者加入到当时进行的各种讨论，在这些作品中，奥古斯丁与对手和辩手直接交锋，或者在对话录文体中发生虚拟的观点碰撞。正是这些文字，最直接地展现了奥古斯丁对这些问题的处置方式以及反应。在对话的状态中，

奥古斯丁的品性才是可以触摸的,而这种品性又规定了宽泛意义上权威诉求的特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权威诉求确实同对话理论(Dialogizität)的标准相符合,奥古斯丁的论战和小册子(他用这些文字驳斥对手)证实了一个著名的判定:教义建设在最激烈的观念交锋中得到发展。

奥古斯丁的“交往行为”(王涛所言)最显著的证据是他的书信集,涵盖了300多封书信,其内容展示了希波主教的行为处事以及他卷入各种神学、牧灵、法律和教会政治争论的情形。书信集塑造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奥古斯丁形象,他不辞辛劳地试图对各种问题作出全面解答。通过这些书信,奥古斯丁再次成为对话录文体当中的导师或者讨论的主持人。不过,不同于老师-学生一问一答的场景(老师只是单纯的提问),奥古斯丁要在书信中直接面对针对他的问题,或者试图通过书信谋求一种权威(正如他后来与杰罗姆的通信所体现的那样,见本书第五章)。书信中发展出来的对话,要比对话录文体更加真实具体。

奥古斯丁是否或者如何在他的生活中实践并且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他在文字中描绘的对话理论,我们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无法给出令人信赖的答案。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奥古斯丁不久就放弃了他在早期作品中大量采用的对话录文体,不仅是认识到对话环境的复杂程度而采取的妥协,而且表达出不断强化自己在教义建设上地位的决心。^①然而在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同各色人等的书信联络显示,他时刻准备着同他人展开对话。事实上,奥古斯丁始终在与不同类型的人辩论,而在经历了各种挑战后,奥古斯丁自己的地位或者出现了调整或者产生了分化,用辩证法的语言表述,就是比早期阶段的虚拟对话具有更真实的效果。

波斯底乌的简短评传可以视为另外一个证据,让我们了解奥古斯丁在教会活动中的对话特性。卡拉玛的波斯底乌是奥古斯丁多年的同事和助手,他把奥古斯丁描绘成一个为维护正统信条与异端和异教徒交锋的斗士(Vita 6; 9; 14; 17)。波斯底乌说,奥古斯丁时刻准备着,要同“希波的市民,外邦的基督徒,大公教信徒和多纳特派追随者”进行辩论,给予他们“信仰的真谛和对上帝的期盼”(Vita 6, 2-3)。波斯底乌的描述还让我们看到,作为修道院修士、牧师和主教的奥古斯丁与他

① 参见 Gillian Clark, “Can we talk? Augustin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in: *The End of Dialogue in Antiquity*, ed. Simon Goldhill, Cambridge 2008, pp. 117-134.

的同侪时刻保持联系的生活状态:他身为同道、牧师、宗教会议的参与者(Vita 21)、宗教法庭的法官(19)和仲裁人(20)的行为处事。在另外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位和蔼的主教,经常与他的同僚在桌边围坐,论及各种问题:关于布道辞的结构和效果(15),关于圣经诵读文字的选择(22, 6-7),当然也包括在希波被蛮族人包围之后教会的命运(29, 1)。在波斯底乌看来,奥古斯丁是心灵的牧师,大公教会信仰的代表,更是主教的理想化身。评传的目标不是为了证明奥古斯丁展开对话的能力,波斯底乌刻画的奥古斯丁与其是一位圣人,不如是一位实践家;奥古斯丁是一个全能型的交流选手,在与各色人等的对话中度过一生。至少,奥古斯丁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来并且被保存的文字证明了这种印象。关于这个特性,波斯底乌描摹的奥古斯丁形象无疑是真实存在的。

王涛的研究重点关注奥古斯丁的交往行为,不仅涉及实践的层面,而且把社会环境,牧灵工作,教会政治以及教义建设等内容纳入了考察范围。他对奥古斯丁的书信进行了整体阅读和阐释,是他最核心的文献。在德语和英语学术圈,学者已经从不同视角对奥古斯丁的书信进行过研究。我在这里列举一个最新案例,Johannes Divjak和他的同事们编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具书“奥古斯丁辞典”,其中的词条“*Epistulae*”(Augustinus-Lexikon, Bd. 3, 2002)对涉及书信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包括通信实践,列传研究和书信所涉及的各项主题等内容。Alfons Fürst对奥古斯丁和杰罗姆的通信进行了翻译和评论(Fontes Christiani 2002),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圣经释读历史的认识,而且能够给我们理解两位人物的交往行为带来启示;Richard Miles在一篇具有挑战意味的文章中,把奥古斯丁描绘成技艺精湛的交际家(Richard Miles, “Let’s (not) talk about it”: Augustine and the control of epistolary dialogue, in: *The End of Dialogue in Antiquity*, ed. Simon Goldhill, Cambridge 2008, pp. 135-148),在涉及教义问题的辩论中,奥古斯丁从一开始就用书信联络的方式把自己同对手连接起来,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时刻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且可以缓和冲突,因为书信的读者往往还包括对争论充满兴趣的民众。

王涛的著作对先前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深度拓展:作为历史研究者,一方面,他把书信作为一份整体文献,是组成奥古斯丁的生平,构建奥古斯丁生活世界的文献。然而,他没有像前人所做的那样,仅仅从书信中挖掘某个信息片断,用以重构奥古斯丁的行传。王涛试图刻画奥古

斯丁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交往空间”：早年生活，担任司祭时期，当选助理主教，经验丰富的主教时期，直到主教的晚年。这样一来，王涛不仅可以把“主教”贴上人际网络构建者的标签，而且还试图描摹主教的交际关系网。另一方面，通过王涛的分析，书信在内容上获得了趣味性，也就是说，书信涵盖了广泛的问题域，奥古斯丁通过书信交流在“虚拟的共同体”中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交际网络的复杂性——恰如与杰罗姆的通信交往——以及因为交往双方无法碰面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这样的书信成为讨论记录），让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在交际网络体系中对所有参与者在思维和行为上发挥影响的努力，不论成功与否。通过这种方式，奥古斯丁让自己成为正统信仰的捍卫者，他以书写的文字作为战斗武器；虽然与奥古斯丁通信的笔友主要来自有教养的阶层，许多人还在社会和政治上有极大影响力，但是同其他文字作品相比，书信不仅能够流传到更广的地理范围，而且对人际关系，以至于问题实质以及现实状态有更加直接的触及。

公元426年9月26日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伊拉克利乌成为奥古斯丁的接班人。对此，会议记录人写下了“正在编纂教会历史”(ep. 213, 2: *ecclesiastica nunc gesta conficimus*)这样的字句，王涛对此的解释让我们看到，奥古斯丁的书信在罗马帝国时代对大公教信仰(*catholica fides*)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可见，在古典时代，奥古斯丁不仅是一个有天分的交际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涉及“正统信仰”的问题上偶尔会采取激进的思考和表达。在王涛看来，这种状态又实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中关于知行合一的理想。

我衷心希望王涛的这部著作，作为作者关于奥古斯丁的研究成果，在书信空间的理论框架下具有说服力。同时，我也期望这本书产生良好的学术效应，能够对中国的奥古斯丁研究有所裨益。

Therese Fuhrer
im August 2010